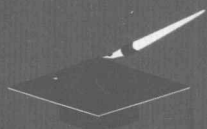


博士文库

颜德如 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

自由主义 与 近代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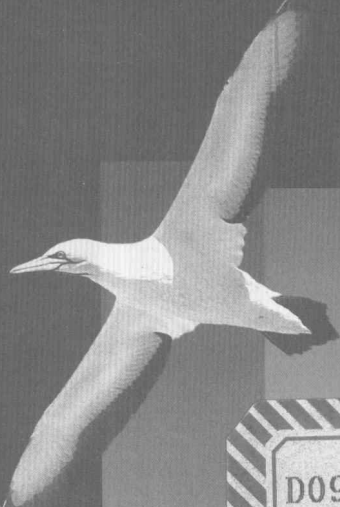


博士文库

颜德如 主编 © 吉林文史出版社

自由主义

与 近代中国



D092
YD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颜德如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12

ISBN 7-80626-866-9

I.自... II.颜... III.①自由主义—研究—中国—近代②自由主义—研究—中国—现代 IV.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6270 号

Ziyou Zhuyi yu Jindai Zhongguo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

颜德如 主编

责任编辑:徐潜 张雪霜

封面设计:李岩冰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8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第九印刷厂印刷 印数:1-1 000 册

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 ISBN 7-80626-866-9/G·440 定价:25.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们敬爱的导师——
宝成关先生

自由主义向何处去？(代序)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近世以来主导的政治思想,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成为那些典型的民主政治国家的公民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审视它的历史,主要就是探究它依靠什么法宝征服了那么多的心灵。

正如胡适先生所说,西方自由主义是在现实的运动之中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入世的。不过,我们似乎还应看到,支撑它得以成长起来的厚重的西方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简要的说,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一)理性与信仰较量的传统;(二)权力与宗教互相抗衡的传统;(三)自然法与契约论传统;(四)尊重法律的传统,等等。聪明的读者,从这里很快就会捕捉到这样的信息: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传统,因此中国就产生不了自由主义。我们不愿意轻易地给出自己的判断,因为,文化传统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不断丰富的庞大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语)。

就是这一发源于异域的思想——自由主义——经由那些肩负着上帝使命的传教士之手,登陆到一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一如马克思所言,凭借封闭与保守维持着自己的尊严。这实际上就预示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诫命。

它的新鲜的知识与不俗的见解,确实征服了不少拖着长辮的中

国士大夫。历史的玩笑就在于：他们用自己的前理解去理解自由主义，常常认为这些东西不足为奇，因为中国的先贤们早已琢磨透了。这一点，就是中西学贯通的严复也未能幸免。我们不禁要问：有着自由传统的近代中国，为何总是在践踏自由？

很显然，不加论证地把自由主义归为自己的“创见”或“家当”，绝对是一种理性的无知与野蛮。因此，已经来到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之清扫出去。这就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应向何处去？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与另一个压倒性的问题联在一起，这个问题就是：近代中国将向何处去？

因此，在我们探讨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世界时，我们发现，他们总是带着自己的关切、兴趣与信仰，来理解和重构了自由主义。所以，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就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家如何去重构自由主义的历史。我们一旦回溯自由主义的历史，我们得到的总是关于自由主义的演变史。那些希望在近代中国社会里，寻找原汁原味的自由主义的人，难免要失望不已。

对此，我们不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悲哀，我们倒觉得这正是自由主义的思想种子再寻播撒的时候。然而，正如聪明的读者所看到的那样，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也是一部饱受折磨的沧桑史。我们深信，不管自由主义将会遭遇何种命运，它揭示的是人的理性和德性不断成长的历史。让我们记住这样的话吧——

教条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已经死去！

颜德如

2003年10月1日

目 录

- 1 中国传统对外观念对早期现代化的影响/田毅鹏、张玉夺
- 17 严复与西方自由主义/宝成关、潘晓斌
- 35 严复对“自繇”思想的解读/宝成关、颜德如
- 50 严复话语中“自由”的涵义/冯英、刘树雨
- 59 严复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罪人吗
——兼评辛亥革命/颜德如
- 74 严复与卢梭思想的传播/颜德如、张传烈
- 87 论严复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价值/冯英、李文良
- 97 梁启超与卢梭思想的传播/颜德如、曹军
- 112 谭嗣同民权观新探/宝成关、颜德如
- 128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新探/颜德如、朱仁政
- 149 张君勱宪政思想论纲
——兼论近代中国宪政的背景
和困境/叶兴艺、郑毅
- 176 张东荪自由主义思想述评/周骁男、刘波
- 201 论罗隆基的人权思想/马振超、刘江涛

- 219 论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异质疏远性
——兼论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林建华、田 全
- 234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历史命运根源
探析/胡锐军、张友国
- √ 247 继承与借鉴：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形成与发展/徐庆利
- 264 密尔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析论/王连伟
- 276 自由的限度
——对哈耶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反思/郭晓东、苗宏慧
- 288 结束语：反对什么样的自由主义?! /颜德如
- 290 作者简介
- 292 后 记

中国传统对外观念对早期现代化的影响

田毅鹏 张玉夺

古代中国人是如何看待外部世界的,这些看法作为观念形态的产物,又是如何内化于官僚士大夫的思想深处,影响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发轫的。这是一个极富历史反思价值的研究课题。

在漫长的封建农业时代,由于地缘的孤立和中华文明长期居于东亚文明的中心地位,使得中国传统对外观念一直具有浓厚的“自我中心”色彩。诸如:“中国中心”的地理观念、华尊夷卑的文化观念、封闭自足的经济观念、“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对外认知观念及以朝贡制度为核心内容、以道德外交为主要特征的外交观念。上述观念虽非对世界的科学理性认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有其存在的客观理由。从历史上看,这些传统观念在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后开始遇到空前的挑战,当时,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每一个非西方国家如果不想灭亡的话,都必须迅速摒弃传统的对外观念,以崭新的近代世界秩序观来认识评价剧烈变动的世界。因此,传统对外观念的转换和更替,便成为影响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发轫至关重要的因素。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

一、中国传统对外观念的一般特质

1. 对外认知观念：“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从历史上看，在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叩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一直生活在东亚大陆的封闭环境中，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始终居于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这养成了中国人“自我中心”的认知习惯，视周边民族为夷狄，不屑去认真研究，形成了“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1]，“外夷部落，荒远难稽，疆圉之外，原可置之不问”^[2]的对外认识传统。

在中国地理学史上，这一认识传统具体表现为“山海经传统”。《山海图》是中国远古时一种比较原始，对后世影响颇深的地图。在其配文《山海经》中存在着两个系统。在南山经、东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中山经中绘出了山名449个，河流湖泊200余处，构成了一幅形象的地形图。另外，在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中，还有专绘神人怪物之类的地图，描绘出了一个离奇古怪、危机恐怖的世界，这构成了《山海经》的两个系统。后随着地图的发展演化，这两种原始地图发生了两个不同方向的蜕变和发展。前者发展为实用的地形图；后者则仍保持原始地图中以神人怪物要素为主，再加绘一些外国奇物怪事和风俗习惯等要素的地图，专用于描绘前来朝贡的周边各族及外国，称为“职贡图”。这种“职贡图”系配合朝贡制度而绘，其特点在于所绘的内容不重各国地理、历史实迹，只突出表示周边“夷狄”朝贡使者的状貌、服饰、风俗、物产等要素。自汉代创始，延至清代，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均无根本性变化。如《隋书·裴矩传》载裴矩所撰《西域图记》三卷，其材料为访胡人所得，其内容则为“依其一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到唐代，据《新唐书·百官志》所载：“职贡图”绘撰之事归兵部职方郎中，每当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所重基本相同。延至清代，这种“职贡图”体制仍然没有发生变化。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皇清职贡图》便完全继承了上述传统。该图的绘制动机是

因“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著沿边各督抚，……仿其服饰，绘图送军机处汇齐”，“所绘内容则为其男子女之状及其诸部长属众衣冠之别。”^[3]以供接待朝贡番夷时使用。

2. 地理观念：“中国中心说”

在人类早期文明史上，因生产力水平的局限和自然环境的阻隔，世界各民族大多都曾深深地陶醉于“自我中心论”之中。中国也不例外，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先民们便认为世界大地是方盘形的，自己居住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因为有中心，就会有四缘，是方形的，当然也就会有中心。即所谓“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子”^[4]。“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5]。中国便居于大地之中。在地理观念方面，明代耶稣会士东来之前，中国人的地理观念基本上是“天圆地方”，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以此种地理观念为基础，历代封建统治者皆以为中国位于地球中央，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极其狭隘，对中国以外的地区多依稀恍惚，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在宋人刻印的《华夷图》、《广舆图》中，周边国家和海洋都被绘得很小，而中国区域则画得颇大。这种狭隘的“自我中心”的地理世界观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对外认识的视野。

3. 文化观念：“华尊夷卑说”

中国幅员广大，种族复杂，文化水准参差不齐。早在统一朝代形成之前，在中原黄河流域地带已经形成了早期华夏文化。这一文化高居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而周边诸族则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遂使中国古代先民们很早便萌发了华夷思想。华夏族认为其它周边民族是下等的落后民族，称之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华夏与夷狄的差异表现在政制、礼仪、饮食、衣冠等很多方面；即所谓“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昏祭礼所自用也。”而夷狄则均反之，“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北方曰狄，毛衣穴居，有不粒食者。”^[5]这种“华尊夷卑”情节在儒家经典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如《论语·八佾》中即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滕文公上》亦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从华夏族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

先哲们留下的名言警句中,可知华夷思想是基于华夏优越文化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是维护儒家以君权为核心、华夷内外的等级名分制度的意识形态。历代封建王朝都特别重视建立以“礼治”为基础的华夷统治秩序。在文化世界观方面,中国历代朝野人士大都持“华尊夷卑”说,认为中国周边的诸族诸国皆为落后的夷狄,在华夷体制内,中国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通过朝贡制度,夷狄定期向天朝朝贡,中国则有教化恩典夷狄的义务。这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是以维护君权为核心,强调华夷内外等级秩序、名分制度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畸形变态的世界观,使中国士大夫养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豪感。

4. 外交观念:“天朝型模”与“道德外交”

在欧洲历史上,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以后,因一统帝国和一统教会理想的破灭,造成了欧洲列国制度的兴起及外交制度的应用。尤其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各国相继建立了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国家主权平等理论日趋盛行,逐渐成为国际社会通行的外交原则。而在东亚,中国早在封建时代初期,便建立了统一的中华帝国,而且其文明发展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使得华夷观念一直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朝贡制度构成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对外关系模式。

所谓“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原王朝处理周边少数民族及属国关系的体制,其渊源可追溯到先秦时代,夏、商、周在与周边的“蛮夷戎狄”打交道时,就要求其朝贡。两汉时代,南越、匈奴、南洋诸国纷纷前来朝贡,朝贡制度正式形成。在朝贡制度下中国传统外交观念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力倡华尊夷卑,拒绝接受主权平等观念。认为中国皇帝是天下的共主,他通过“朝贡”和“册封”等途径向周边诸国宣布道德教化,怀柔恩典远人。而来华朝贡之使节一概被称为“贡使”。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以体现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其二,推行道德外交原则。朝贡制度以中原王朝宗族制度为前提,其宗旨为“四夷顺而中国宁”。在经济上,朝贡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厚往薄来”,即前来朝贡的“蛮夷”虽然携带贡品来朝,但中国皇帝

并不贪恋贡品,其回赐一般都远远厚于贡品,以怜悯远人,达到道德精神境界上的满足。同时,中原封建王朝对于诸外夷在朝贡的机会上强调均等,以示“天朝”公允持平。基于此,中国传统的对外交涉方式也通常用道德谴责来代替利害的判断和权衡。

5. 经济观念:天朝物产丰盈,不与外夷互通有无

远古时代,商业本为社会所重视。而至秦汉后则风气大变,轻商重农之议骤起,并从此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遵行不辍的国策。作为封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对外表现,在对外通商方面,除了极少数开明分子承认对外贸易的价值之外,历代统治者一般都是从维护自然经济出发,根本否定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其代表性观点有二:其一,中国地大物博,物质生活所需无待外求,惟有外人对中国必有所需。从历史上看,由于地缘上的孤立性和“华尊夷卑”的文化优越意识,加之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使得古人视中国社会为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系统,生活无待外求。相反,周边的夷狄其生存则必事事仰给中华。

其二,渲染“洋货无用论”。封建时代,由于交通阻塞、经济落后,跨国越洲、飘洋过海的域外贸易通商往往都具有体轻价贵的特点,其主体多为奢侈品。如汉代番禺外贸商品“多犀象、玳瑁、珠玢、银铜、果布之凑。”^[6]唐代广州舶来品也“皆犀象珠琲之类”^[7]。显然,这种对外通商不是出于国内生产的需要,往往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因此,历代统治者常视海外贸易为奢侈罪恶之源,称舶来品为“奇技淫巧”,严禁入口。在这种封闭自足、蔑视洋货的陈腐观念支配下,即使是封建阵营中比较开明的人士也很难意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树立近代外贸观念。在他们看来,洋货大多是无用的奢侈品。认为“凡洋货之至中国者,皆所谓奇巧无用者也。是洋人作奇技淫巧以惑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8]同时期的吴嘉宾也说:“凡挟货赴粤者,所得厚利皆钟表、呢羽、洋货、洋烟之属,辗转流市,而重货则尽寄于粤而不得返,……此壅彼涸,其势固然。故非鸦片毒饵宜禁,他淫巧之物皆宜禁也。”^[9]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

二、传统对外观念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发轫

与西方“早发内源型”现代化相比,非西方国家“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属于“感应型”、“传导型”、“外诱型”的现代化,此种类型现代化勃兴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后发性”和“感应性”,即其现代化的启动发轫不是其社会内部现代性因素积累、发展、演变的产物,而是其面对外部现代性“挑战”所作出的积极的、有意识的“回应”。从历史上看,在文明剧烈变迁的时代,对于那些仍停留在传统社会形态的或已产生新文明的萌芽但却未实现质变式突破的国家来说,传统世界秩序观的改变,是其文明盛衰最为关键的因素。

因为与封建时代人类文明的“区域分立”不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大的特点是其“扩张性”和“不平衡性”。即当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率先勃兴,并浮海东来之际,绝大多数的非西方国家尚处于封建农业时代,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着相当悬殊的落差。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已率先兴起的形势下,无论这些非西方国家是否产生了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新变化,这种严重失衡倾斜的世界文明格局,已不允许这些国家自生现代工业文明,自然而然地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面对西方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冲击挑战,非西方国家所作出的最初的“回应”行动就是对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学习和摄取。而在学习、摄取西方文明之前,必须首先抛弃传统的“自我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科学而客观的估价,承认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性,形成新的科学实证的世界秩序观。只有这样,东方国家的现代化才能顺利地启动运行。很难想象,在视西洋人为“化外夷狄”,视西方文化为野蛮文化的情况下,以摄取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运动会勃然兴起。因此,传统世界秩序观的改变,是非西方国家早期现代化启动发轫最关键的前提条件。

从世界历史上看,非西方国家新的世界秩序观的形成,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民族常常是经过长期反复的认识,甚至是几代人

的探索,才对激变的世界形势有了清楚的认识,结果在时间上错过了实现现代化的良机。如前所述,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体系化、理论化的对外观念,对其世界秩序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 传统对外认知观念抑制了国人认识世界的欲望。

如前所述,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外部世界乃是野蛮的夷狄居住地,无足挂齿,是一种可以忽略的存在。翻检明清时期的典籍,我们会发现,清人编写的旨在适应朝贡体制需要的职贡图,即代表了中国对外认识“不求其详”的“山海经传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历史进程。在《皇清职贡图》“英吉利”条中,以较大的篇幅绘制了“英吉利夷人”、“英吉利夷妇”两幅人物图画,但对英吉利这样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殖民强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却没有一点介绍。在仅仅几十字的解释文字中却错误百出,竟称:“英吉利亦荷兰属国也。”^[3]其余的文字则主要描述英人饮酒、束腰、发型等习俗特征,读罢这段文字,很难使人对当时蛮横异常的世界殖民强国有一个基本的印象。当时,英国与中国已经交往了百年之久,只要稍加留意,便不至发生上述错误,这说明明清朝野人士对外部世界是何等的漠视。

这种长期漠视外部世界的认知传统在明清“海道大开”之际表现得更加突出。当时来华耶稣会士曾译刊了一大批世界史地著作,输入了“五大洲”、“地圆说”等世界地理新知,并具体地介绍了西洋诸国的风土人情。同时,广州和澳门作为西方力量东侵在远东的中心地区,也不失为中国瞭望世界的窗口。应该说,此时期的中国已经具备认识世界的诸多便利条件。但是,在成书于清雍、乾年间的《明史》“佛郎机传”、“意大利亚传”、“荷兰传”中,对于西方的情况仍然是隔雾看花,竟称西班牙、葡萄牙为“佛郎机”,其地理位置“近满刺加”,称荷兰为“红毛蕃”,只注意“其人深目长鼻,发须皆赤,足发尺二寸,欣伟倍常”。而对西洋诸国的政治、军事情况只字不提,其用语和心态,都与《山海经》中描绘远国夷人无根本差别。从历史上看,正是这种“等闲视之”、“漠然不精求”的“自我中心”的对外认知观念,限制了国人认识世界的历史进程,使得统治阶级对西方的认识处于模糊混沌

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

之中。

一个国家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是其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历史。明清时期,封建士大夫陶醉于“华尊夷卑”的天朝意识之中,藐视一切,闭目塞听,自然无法睁眼看世界,无法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东侵所带来的空前的历史变局,其以学习西方为核心的现代化运动自然无法兴起。

2. 华夷观念的畸变影响了对世界的理性认识。

从16世纪上半叶开始,通过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国传统的“文化世界观”发生了不同路向的变化。明清时期,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少数开明士大夫开始摒弃文化偏见,承认西学在某些方面优于中国文化,认识到“泰西”诸国并非茹毛饮血的“夷狄之邦”,那里也有“声教”、“礼义”,也有自己的文明和风俗。据利玛窦回忆,一位与他有往来的医生,曾向他表达自愧不如之意。所有这些都表明有些人们已逐渐对“中国文化中心观”产生了怀疑,其文化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但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具有“现代”意义的卓见只限于明中后期和清初极少数士大夫之中。随着清政府对外采取闭关政策,绝大多数的朝野人士仍固守传统的地理观念,对五大洲、地圆说深拒固纳,仍然陶醉于浓烈的“天朝意象”之中,难以自拔。面对激变的世界文明格局,其华夷观念非但没有发生转变,却发生了畸变,变成了一种非理性的东西。

从历史上看,这种转变是在以下两种力量的推动下完成的。一方面,明清王朝是这个历代封建政权中最讲究华夷之辨的王朝。这是因为明政权是驱逐元朝,恢复“中华”的产物,而清朝则是以“东夷”的身份入主中原,“名不正,言不顺”,在对内统治中非常忌讳自己的“夷狄”身份,所以在对外关系中大力提倡华夷之辨,企图借此把汉族视满族为夷狄的看法转移到西洋民族身上,以提高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早期西洋各国贸易商人为牟取贸易之利,对中国封建王朝一切惟命是听,甚至行三跪九叩之礼,也强化了国人的华夷观念。据记载,1637年,英吉利贸易远征队加比丹威里的代理者,对于广东的官吏,曾执跪拜礼。此外,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之使节也都多次行“三

跪九叩”的大礼。“此等使节，即经弃其国威，而中国之傲慢心，因之益形增长。且更有可鄙夷者，当时商人中，如丹麦人、葡萄牙人、英吉利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等，因商业竞争，欲垄断其利，故互相倾排诋于中国人之前，甲曰某国人怀诈而来，不可近，已复报之。以故，中国人之视欧洲人，以为昏射利而忘义者”^[10]，更加鄙视夷狄。从华夷观念出发，士大夫们把“英吉利”、“意大利亚”、“佛朗机”等西方国家视为夷狄，列入中华帝国的朝贡系统。在经济上，中国“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政治上，中国是居于“天下之中”的“天朝”，远方的夷狄应以三跪九叩的大礼前来称臣纳贡。有些士大夫还把西学的起源归于中国，认为西学既然源于中国，人们自然不必认真学习西学，只要埋头中学，即可得到西学，这严重阻碍了西学的输入，障碍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使得处于文明剧变前夜的近代中国根本无法直面世界，产生开放意识，其现代化也自然无法启动。

3. 滞缓了近代危机意识的形成

在汉语语汇中，所谓“危机”主要是指危险的祸根或严重困难的关头。在一般意义上讲，危机意识是人类面对社会内部矛盾危机和外部挑战压力而产生的一种不安全感。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将“危机意识”作为非西方国家早期现代化启动发轫的重要条件，主要是因为这里所说的危机意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西方与非西方国家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明显差距而产生的来自外部的现代性挑战，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忧外患”。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扩张，已经给所有的非西方国家的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成为其国家政权所必须正视的问题，能否敏锐迅捷地体认到这空前的“世界变局”，确立危机意识，便成为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遍观 18 世纪下半叶思想界的社会政治思想主张，我们会发现：清中叶的经世派和今文经学思潮的代表者虽然都意识到封建王朝已开始面临严重的危机局面，但其思想主张都是围绕着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一主题而展开的。有的学者认为，道光六年（1826）《皇